

公元 2049 年，新中国 100 岁，21 世纪行至中叶，中国和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最重要的，这跟我們有什么关系？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捕捉了当年若干个被史学家忽略的“末端小事”，并从中发现了掀起未来波澜的机缘。“高和·2049 论坛”亦致力于从当下的种种，窥见未来些许端倪。

在这里，你也许难见吸引眼球的标题和情绪化的宣泄，但必将不乏洞见、高见、远见。我们希望与你心有灵犀，一起走向 2049。

## 导读

专稿 >

### 新型城镇化或将出人意料

文 / 陈功 安邦咨询集团董事长、首席研究员

被一拖再拖的全国城镇化会议终于要召开了。据说推迟的原因就在于高层对原先方案不满意。这也将佐证本文的核心观点：城镇化的理论实际上是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顺着这个思路，未来的城镇化将发生许多具有颠覆性的事情

智库 >

###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红？

文 /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

大数据？以前我们也就听听，觉得那是技术领域的问题。但马云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大家还没搞清 PC 时代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来了，还没搞清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大数据时代来了。”其实，很大程度上，马云的观点源于本文作者。《经济学人》说，在大数据领域，维克托是最受人尊敬的权威发言人之一。维克托认为，大数据不仅能改变商业，还能改变个人生活乃至整个社会

### 大数据：小心适得其反！

文 / 克里斯托弗·米姆斯

诚实的大数据从业者——数据科学家们持有高度的怀疑精神，他们为我们列出了厌倦大数据的一串理由

### 别急着为日本重振叫好

文 / Pierre Siklos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CIGI) 高级研究员

日本央行新行长上任后，大幅调整日本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预期。但作者认为，日本央行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难以实现

### 从瑞典事件到中国城镇化

文 / 北欧驼鹿 旅欧学者 康向宇 经略网刊编辑

近期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暴力冲突事件，看似意外，实则由来已久。从欧洲和美国在福利制度及移民政策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出一二，而如果把把这些发现与中国的城镇化联系起来看，则能给人很大启发

出品：

高和  
GOWHEE 中国商业地产基金的领跑者

信睿  
Thinker 信睿智库

制作：

《经济导刊》

编辑信箱：

wangfang@citicpub.com

huanghaichuan@citicpub.com

征订信箱：

zhangchen@gohighfund.com

预告：

下期《高和·2049 论坛 - 智库精选》

将于 6 月中出品

敬请期待！



## 新型城镇化或将出人意料

被一拖再拖的全国城镇化会议终于要召开了。据说推迟的原因就在于高层对原先方案不满意。这也将佐证本文的核心观点：城镇化的理论实际上是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顺着这个思路，未来的城镇化将发生许多具有颠覆性的事情

文 / 陈功

“新型城镇化”提出以后，紧接着应该出台一个新的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原来的报道是，十八大、两会结束后会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新型城镇化的工作会议，到时一切就明白、清晰了。两会期间记者采访要求获得信息最多的也是跟新型城镇化有关的。结果两会结束了很长的时间，关于新型城镇化的信息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

全国性的工作会议仍没有召开，而且信息还变得越来越令人感觉奇怪，变得非常分散。这种状态说明新型城镇化究竟怎么样，包含什么内容，向什么样的方向努力，都还没有取得共识。

全国性的工作会议仍没有召开，而且信息还变得越来越令人感觉奇怪

回想一下，当时提出来的在新型城镇化的框架之下，两万个小城镇要进行建设，涉及到的投资达 40 万亿，这是这么惊人的规模，十倍于 2008 年危机之后温家宝总理的 4 万亿宏观经济的刺激计划。然而，我们的宏观经济体系、金融体系、老百姓、消费者是不是能够承受如此的规划？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城镇化的理论实际上是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国内在讨论城镇化问题上，学者以经济背景的人士居多，研究城市文化学和社会学等的学者很少，对城市本身的讨论少，因此就会出现比较偏颇的局面。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之中的积聚，这也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当中出现了财富的积聚，有钱才可以买房子，出现更多的消费。但由“城市化”变成“城镇化”的时候，它的建设重点和发展轴向不是向城市聚集，不是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发展，而是转向脱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向更下一层，向县级城市，甚至是你没有听说过的那些城市在发展。这个过程跟所谓的城市化的过程，跟我们感受到的城市化过程是相反的，是逆向的一个过程。所以，过去历史上常见的逆城市化过程不就是现在的状态吗？只不过我们刚刚开始而已，谁能担保在若干年之后不会加剧和提速呢？现在来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顺着这个思路，我想谈一些跟未来有关系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城市尺度的重构。

在纽约，中央商务区有一大堆高楼大厦，但是就那一片高楼大厦的规模也不如我们。在中央商务区之外，更常见的住宅街道的楼层很高，给大家的感官是很挺拔，但是仔细数数却只有十来层，这是最典型的纽约住宅情况。现在我国不管是开发商，还是地方政府，盖楼都是要高，但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样做到底是好或是不好？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城市尺度的重构是我们未来 30 年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你乐意或者不乐意。

我见过很多的城市，只有二三百万人口规模，其中有一些高低错落的小高层，它

由“城市化”变成“城镇化”的时候，它的建设重点和发展轴向不是向城市聚集，不是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发展，而是转向脱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向更下一层，向县级城市，甚至是你没有听说过的那些城市在发展

的城市形态非常美。有些市长去国外参观的时候，他也很感慨，认为国外的城市，比如德国，奥地利，瑞士的城市很美。但他一回国，一开会就倡议要盖起码 50 层以上的高楼，要盖天下最高的高楼。

那么什么是美？什么是尺度？北京的老胡同里，邻里关系和人际的交流非常和谐，现在我们改变尺度之后，能有这种关系体现出来吗？根本不可能。你连邻居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大家之间老死都不相往来。我记得小时候，小学老师跟我们讲，在日本、美国，一个邻居在房间里死了三个月以后都没被发现，同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快要发生了，而且今后更为恶劣。现在老大爷倒在马路上，可能好几百人看着都没人去伸手帮忙。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尺度关系到邻里关系、关系到社区、关系到很多的问题，如果你对这种状态不满意的话，就要重新构思，要恢复重建这种尺度。这就是未来 30 年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

在山东的一个城市，有一条据说是“天下第一宽”的马路，双向十六车道。一般体力差点的是不能过马路的，因为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才可以冲过去。每次国土资源部在抽查各地的建设情况的时候，他们都要组织当地的农民工，把车道的一部分撒上土，这样从飞机上看下来都是农田；等飞机过去以后再把土铲掉，又变成十六车道宽的大马路。在这种尺度的情况下，这个城市能漂亮，能美观吗？那是不可能的。这种建设，究竟是从人性需求还是其它的角度进行考虑的？或仅仅是一种盲目的追求？还有好多的领导跟我讲，我建超高层，是因为想有一个漂亮的天际线。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你是冲哪边看天际线，如果你要转来转去，这个城市的摩天大楼不是多得不能设想？这就是一个城市的尺度问题。

当道路非常宽的话，两边的建筑也要非常高，或者反过来，只有超高的建筑，才需要这么宽的马路。这还只是城市大系统的一个节点部分，如果放在整座城市更大的范围看，它的影响更恶劣，整座城市都要为某几个特意去营造的城市节点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这些被特意营造的关键节点周边，所有道路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现在看到的道路拥挤等情况肯定会出现，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品质因为时间的花费，生活成本的提高等都会导致整个城市生活品质下降。

相比较而言，在湖北咸宁，你会看到它的生活节奏变慢了，街道之间的感觉和气氛都非常好。正是因为它的尺度，周围的商业设施才是有用途、有价值的。前面提到的十六车道的大马路，周边会有商铺吗？你要买个汉堡包，还要把自己锻炼成刘易斯才行，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咸宁这样的尺度下，就会出现。咸宁整个城市大概 200 多万人，地方政府和官员也想改造，也想建工业区、建高楼，但是出于历史和文化等的种种原因，且这个城市又盛产桂树，桂树是它的一大产业，所以它不太敢改造原有的街道，这才形成现在这样的格局。类似这样的中小城市在中国还有很多，今后他们将面临新的发展机会。

如果放在整座城市更大的范围看，它的影响更恶劣，整座城市都要为某几个特意去营造的城市节点付出高昂的代价

过去的上海，曾经是一个非常优雅、漂亮的城市，堪比巴黎。但是现在随着尺度的变化，楼层的拔高，这个城市正逐渐改变。

在中国很多城市，有很多体量大的广场，完全是用各种各样的硬铺砖、石材覆盖，随处可见。好多城市领导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城市广场，自己的政绩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大的广场全部用石头铺好，所以雨水没有办法渗透到地下，寸草不生。而且，投资量非常大，财政负担很重。虽然吃力不讨好，但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管多大体量的中国城市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是很可怕的。我期待这个问题也会在未来 30 年得到解决。我想，大规模地炸掉一些楼、一些广场在未来 30 年是会出现的情况。

德国的罗登堡是一个很有中世纪风格的城市，它的城市构成向大家展示了中世纪

开始一个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央广场是它的核心部分，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旁边可能就会有教堂；教堂又形成了人的积聚，为了办事的方便，所以附近有市政厅；为了取得神灵宽恕的同时，也要满足人们的交易等生产活动，还要赚钱，所以附近一般还有市场，比如酒类市场；一些富裕起来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为了生活的方便，于是在附近构建了住宅，同时还有一些商业性的餐厅等等。围绕中央广场就形成一个典型的城市的的关键节点，整个城市也就从这个点上发育、成长起来。如果人口增多，满足不了多种需要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就是建造教堂和广场。在欧洲，会选择另外一个地方，再建一个教堂和广场，复制以上所说的住宅、市场等等。于是城市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中心。一个中心、两个中心、三个中心，城市就变成多中心的城市。

我们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城市环，这种“环”在未来30年也是应该重构的

我们的情况正相反，我们的城市完全都是单核心的。比如北京，从一环到六环，甚至还讨论过要建七环。而且北京的这种模式也被很多城市复制。比如郑州、成都、沈阳等，都是这样。这也是中国的城市未来30年需要重构的原因，它都是单核心的，搞成了摊大饼的情况。如果你居住在这样的城市，想到坐地铁去某个地方上班，想象下地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每天要运送几十万、上百万人口到这一个地方上班，下班之后又要把这些人再运送回他们住的地方，这就是功能分区的荒谬之处。

如果从有机城市的角度来看，理论上的城镇应该是多中心的，是自然形成的。但是因为城市管理者并非是明智的，他们的喜好左右了城市正常、健康的生长，打断了它生长的节奏，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城市环，这种“环”在未来30年也是应该重构的。

有没有重构的可能呢？当然有人会说，你这可能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现实中是有这种例子的。

首尔的清溪川原来是有高架路的，但为了重构城市就把它全炸掉了。所以在国外是有这样的例子的。我们现在都认为大水坝和大水库是正常的，美国早就启动了一项炸坝运动，炸掉了很多的水坝。

首尔的清溪川原来是有高架路的，但为了重构城市就把它全炸掉了。所以在国外是有这样的例子的。我们现在都认为大水坝和大水库是正常的，美国早就启动了一项炸坝运动，炸掉了很多的水坝

路网的问题也很多。高架路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高架路能够在城市这个模型中对几个节点赋予优先通行权，提升它的地位。但问题是，这几个被赋予优先级地位的节点，对整个系统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也就是说，以别人付出的代价，来方便这几个节点，比如机场到市中心的高架路等。BRT（快速公交系统）的问题很大。它一方面把道路弄得很宽，另一方面把城市的空间割裂开来。城市本来是一个整体，这边可以享受那边的物流，那边可以享受这边的人流，这一割裂使整个城市空间的价值被一分为二，降低了50%。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为了解决交通而解决交通并不是明智的做法，也是未来需要改变和重构的。

空间标准的重构也是必须的。目前两米多层高的建筑，表面上节约了材料，但实际上消耗了大量的能源。我们就像是住在一个人类仓库里面，能塞进去多少人就塞进去多少人，根本谈不上舒适度。如果标准层高适当提高，尤其在热带地区，对能源的使用是非常有帮助的。与此相关的是太阳能。我一直期望再做一些工作推动，把太阳能光伏的使用加以规范化，但是现在为止都不成功。

安邦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研究“后土地经济”。中国把经济发展简化成了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简化成GDP，把GDP简化成房地产。这就变得很直接，这种情况就是“土地经济时代”的关键词。“后土地经济”跟它相比主要强调管理和服务，尤其是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取代土地出让金最关键的是社区的管理性收费，因为它是在存量基础上考虑问题的，这就是“后土地经济”的关键。有了钱，接着就可以

进行城市运营，社区分级，环境景观建设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物权基础上对房产真正的私有。现在来看，差距还比较明显。可能会有人说这是空想，但我想未来 30 年对“后土地经济”的讨论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在未来 30 年，超级城市没什么吸引力了，它已经是全面超载的状态。（我们要反思一下，为什么禽流感之类的事情在中国总是给城市造成很大的问题？但同样的问题也曾发生在德国、波兰、非洲、澳洲，为什么没有给别国留下这么大的冲击和影响呢？）所以，精品时代正逐渐接近。

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会不会变得没有更多利润可赚呢？利润有两个，一是真金白银，另一个是风险。风险如果变得很小，利润其实也就变得相对高了。当大家都关注中小城市的时候，一千亿的投资，如果有 30% 的利润率，就会有获得三百亿的利润，进一步转化成购买力。如果大家都这么看，中小城市就会有生意，有市场。

---

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会不会变得没有更多利润可赚呢？利润有两个，一是真金白银，另一个是风险

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就有两次大规模的城市重建。**第一次是 1949 年建国后的苏俄时期，文革时期的红色建筑其实对中国而言也是大规模的重建。上海和北京大概在 1978 年或者 1976 年之前，用那种成套的板楼图纸，把整个城市建了一片又一片。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的重建。

所以，**大规模的城市重建在未来 30 年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未必发生在超级城市（指一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大多数可能发生在中小城市。未来的希望是在 300 万人口的城市。

（陈功系安邦咨询集团董事长、首席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高和-2049 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红？

大数据？以前我们也就听听，觉得那是技术领域的问题。但马云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大家还没搞清 PC 时代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来了，还没搞清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大数据时代来了。”其实，很大程度上，马云的观点源于本文作者。《经济学人》说，在大数据领域，维克托是最受人尊敬的权威发言人之一。维克托认为，大数据不仅能改变商业，还能改变个人生活乃至整个社会。大数据之所以可能成为一个“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一个可以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八面出击，处处结果的社会运动

文 /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斯·库克耶  
译 / 盛杨燕 周涛

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

### 变革公共卫生

2009 年出现了一种新的流感病毒（甲型 H1N1 流感），在短短几周之内迅速传播开来。全球的公共卫生机构都担心一场致命的流行病即将来袭。有的评论家甚至警告说，可能会爆发大规模流感，类似于 1918 年在西班牙爆发的影响了 5 亿人口并夺走了数千万人生命的大规模流感。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没有研发出对抗这种新型流感病毒的疫苗。公共卫生专家能做的只是减慢它传播的速度。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先知道这种流感出现在哪里。

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都要求医生在发现新型流感病例时告知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但由于人们可能患病多日实在受不了了才会去医院，同时这个信息传达回疾控中心也需要时间，因此，通告新流感病例时往往会有一两周的延迟。而且，疾控中心每周只进行一次数据汇总。然而，对于一种飞速传播的疾病，信息滞后两周的后果将是致命的。这种滞后导致公共卫生机构在疫情爆发的关键时期反而无所适从。

在甲型 H1N1 流感爆发的几周前，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的工程师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它令公共卫生官员们和计算机科学家们感到震惊。文中解释了谷歌为什么能够预测冬季流感的传播：不仅是全美范围的传播，而且可以具体到特定的地区和州。谷歌通过观察人们在网上的搜索记录来完成这个预测，而这种方法以前一直是被忽略的。谷歌保存了多年来所有的搜索记录，而且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球超过 30 亿条的搜索指令，如此庞大的数据资源足以支撑和帮助它完成这项工作。

谷歌公司把 5000 万条美国人最频繁检索的词条和美国疾控中心在 2003 年至 2008 年间季节性流感传播时期的数据进行了比较。他们希望通过分析人们的搜索记录来判断这些人是否患上了流感，其他公司也曾试图确定这些相关的词条，但是他

---

在甲型 H1N1 流感爆发的几周前，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的工程师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它令公共卫生官员们和计算机科学家们感到震惊

们缺乏像谷歌公司一样庞大的数据资源、处理能力和统计技术。

虽然谷歌公司的员工猜测，特定的检索词条是为了在网络上得到关于流感的信息，如“哪些是治疗咳嗽和发热的药物”，但是找出这些词条并不是重点，他们也不知道哪些词条更重要。更关键的是，他们建立的系统并不依赖于这样的语义理解。他们设立的这个系统唯一关注的就是特定检索词条的使用频率与流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之间的联系。谷歌公司为了测试这些检索词条，总共处理了 4.5 亿个不同的数学模型。在将得出的预测与 2007 年、2008 年美国疾控中心记录的实际流感病例进行对比后，谷歌公司发现，他们的软件发现了 45 条检索词条的组合，将它们用于一个特定的数学模型后，他们的预测与官方数据的相关性高达 97%。和疾控中心一样，他们也能判断出流感是从哪里传播出来的，而且判断非常及时，不会像疾控中心一样要在流感爆发一两周之后才可以做到。

所以，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爆发的时候，与习惯性滞后的官方数据相比，谷歌成为了一个更有效、更及时的指示标。公共卫生机构的官员获得了非常有价值的的数据信息。惊人的是，谷歌公司的方法甚至不需要分发口腔试纸和联系医生——它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当今社会所独有的一种新型能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深刻的洞见。基于这样的技术理念和数据储备，下一次流感来袭的时候，世界将会拥有一种更好的预测工具，以预防流感的传播。

## 变革商业

大数据不仅改变了公共卫生领域，整个商业领域都因为大数据而重新洗牌。购买飞机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基于这样的技术理念和数据储备，下一次流感来袭的时候，世界将会拥有一种更好的预测工具，以预防流感的传播

2003 年，奥伦·埃齐奥尼 (Oren Etzioni) 准备乘坐从西雅图到洛杉矶的飞机去参加弟弟的婚礼。他知道飞机票越早预订越便宜，于是他在这个大喜日子来临之前的几个月，就在网上预订了一张去洛杉矶的机票。在飞机上，埃齐奥尼好奇地问邻座的乘客花了多少钱购买机票。当得知虽然那个人的机票比他买得更晚，但是票价却比他便宜得多时，他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他又询问了另外几个乘客，结果发现大家买的票居然都比他的便宜。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被敲竹杠的感觉也许会随着他们走下飞机而消失。然而，埃齐奥尼是美国最有名的计算机专家之一，从他担任华盛顿大学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开始，他创立了许多在今天看来非常典型的大数据公司，而那时候还没有人提出“大数据”这个概念。

1994 年，埃齐奥尼帮助创建了最早的互联网搜索引擎 etaCrawler，该引擎后来被 InfoSpace 公司收购。他联合创立了第一个大型比价网站 Netbot，后来把它卖给了 Excite 公司。他创立的从文本中挖掘信息的公司 ClearForest 则被路透社收购了。在他眼中，世界就是一系列的大数据问题，而且他认为自己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哈佛大学首届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自 1986 年毕业以来，他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飞机着陆之后，埃齐奥尼下定决心要帮助人们开发一个系统，用来推测当前网页上的机票价格是否合理。作为一种商品，同一架飞机上每个座位的价格本来不应该有差别。但实际上，价格却千差万别，其中缘由只有航空公司自己清楚。

埃齐奥尼表示，他不需要去解开机票价格差异的奥秘。他要做的仅仅是预测当前的机票价格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上涨还是下降。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但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这个系统需要分析所有特定航线机票的销售价格并确定票价与提

当得知虽然那个人的机票比他买得更晚，但是票价却比他便宜得多时，他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他又询问了另外几个乘客，结果发现大家买的票居然都比他的便宜

前购买天数的关系。

如果一张机票的平均价格呈下降趋势，系统就会帮助用户做出稍后再购票的明智选择。反过来，如果一张机票的平均价格呈上涨趋势，系统就会提醒用户立刻购买该机票。换言之，这是埃齐奥尼针对9000米高空开发的一个加强版的信息预测系统。这确实是一个浩大的计算机科学项目。不过，这个项目是可行的。于是，埃齐奥尼开始着手启动这个项目。

埃齐奥尼创立了一个预测系统，它帮助虚拟的乘客节省了很多钱。这个预测系统建立在41天之内的12000个价格样本基础之上，而这些数据都是从一个旅游网站上爬取过来的。这个预测系统并不能说明原因，只能推测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它不知道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机票价格的波动。机票降价是因为有很多没卖掉的座位、季节性原因，还是所谓的“周六晚上不出门”，它都不知道。这个系统只知道利用其他航班的数据来预测未来机票价格的走势。“买还是不买，这是一个问题。”埃齐奥尼沉思着。他给这个研究项目取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叫“哈姆雷特”。

这个小项目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得到了风险投资基金支持的科技创业公司，名为Farecast。通过预测机票价格的走势以及增降幅度，Farecast 票价预测工具能帮助消费者抓住最佳购买时机，而在此之前还没有其他网站能让消费者获得这些信息。

这个系统为了保障自身的透明度，会把对机票价格走势预测的可信度标示出来，供消费者参考。系统的运转需要海量数据的支持。为了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埃齐奥尼找到了一个行业机票预订数据库。而系统的预测结果是根据美国商业航空产业中，每一条航线上每一架飞机内的每一个座位一年内的综合票价记录而得出的。如今，

Farecast 是大数据公司的一个缩影，也代表了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五年或者十年之前，奥伦·埃齐奥尼是无法成立这样的公司的

Farecast 已经拥有惊人的约2000亿条飞行数据记录。利用这种方法，Farecast 为消费者节省了一大笔钱。

2008年，埃齐奥尼计划将这项技术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宾馆预订、二手车购买等。只要这些领域内的产品差异不大，同时存在大幅度的价格差和大量可运用的数据，就都可以应用这项技术。但是在他实现计划之前，微软公司找上了他并以1.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Farecast公司。而后，这个系统被并入必应搜索引擎。

Farecast 是大数据公司的一个缩影，也代表了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五年或者十年之前，奥伦·埃齐奥尼是无法成立这样的公司的。他说：“这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他所需要的计算机处理能力和存储能力太昂贵了！虽说技术上的突破是一切得以发生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一些细微而重要的改变正在发生，特别是人们关于如何使用数据的理念。

有趣的是，这些飞行记录和谷歌的搜索记录一样，也可以用来预测和评估疾病的流行。

### 变革思维

人们不再认为数据是静止和陈旧的。但在以前，一旦完成了收集数据的目的之后，数据就会被认为已经没有用处了。比方说，在飞机降落之后，票价数据就没有用了（对谷歌而言，则是一个检索命令完成之后）。

事实上，一旦思维转变过来，数据就能被巧妙地用来激发新产品和新型服务。数据的奥妙只为谦逊、愿意聆听且掌握了聆听手段的人所知。

信息社会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口袋里都揣有一部手机，每台办公桌上都放有一台电脑，每间办公室内都拥有一个大型局域网。但是，信息本身的用处却并没有如此引人注目。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全面融入社会生活，

埃齐奥尼创立了一个预测系统，它帮助虚拟的乘客节省了很多钱。这个预测系统建立在41天之内的12000个价格样本基础之上，而这些数据都是从一个旅游网站上爬取过来的。这个预测系统并不能说明原因，只能推测会发生什么

信息爆炸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开始引发变革的程度。它不仅使世界充斥着比以往更多的信息，而且其增长速度也在加快。信息总量的变化还导致了信息形态的变化——量变引发了质变。最先经历信息爆炸的学科，如天文学和基因学，创造出了“大数据”这个概念。如今，这个概念几乎应用到了所有人类致力于发展的领域中。

今天，一种可能的方式是，亦是本书采取的方式，认为大数据是人们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做到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小规模数据的基础上是无法完成的。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

最惊人的是，大数据社会需要人类放弃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仅需关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只需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就推翻了自古以来的惯例，而我们做决定和理解现实的最基本方式也将受到挑战。

### 开启重大的时代转型

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与其他新技术一样，大数据也必然要经历硅谷臭名昭著的技术成熟度曲线：经过新闻媒体和学术会议的大肆宣传之后，新技术趋势一下子跌到谷底，许多数据创业公司变得岌岌可危。当然，不管是过热期还是

2003年，人类第一次破译人体基因密码的时候，辛苦工作了十年才完成了三十亿对碱基对的排序。大约十年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基因仅每15分钟就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

是幻想破灭期，都非常不利于我们正确理解正在发生的变革的重要性。

就像望远镜能够让我们感受宇宙，显微镜能够让我们观测微生物，这种能够收集和分析海量数据的新技术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这种理解世界的新方法我们现在才意识到。本书旨在如实表达出大数据的内涵，而不会过分热捧它。当然，真正的革命并不在于分析数据的机器，而在于数据本身和我们如何运用数据。

天文学领域的变化在各个领域都在发生。2003年，人类第一次破译人体基因密码的时候，辛苦工作了十年才完成了三十亿对碱基对的排序。大约十年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基因仅每15分钟就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在金融领域，美国股市每天的成交量高达70亿股，而其中三分之二的交易都是由建立在数学模型和算法之上的计算机程序自动完成的。这些程序运用海量数据来预测利益和降低风险。

互联网公司更是要被数据淹没了。谷歌公司每天要处理的数据是美国国家图书馆所有纸质出版物所含数据量的上千倍。Facebook这个创立时间不足十年的公司，每天更新的照片量超过1000万张，每天人们在网站上点击“喜欢”（Like）按钮或者写评论大约有三十亿次，这就为Facebook公司挖掘用户喜好提供了大量的数据线索。

与此同时，谷歌子公司YouTube每月接待多达8亿的访客，平均每秒钟就会有一段长度在一小时以上的视频上传。Twitter上的信息量几乎每年翻一番，截止到2012年，每天都会发布超过4亿条微博。

从科学研究到医疗保险，从银行业到互联网，各个不同的领域都在讲述着一个类似的故事，那就是爆发式增长的数据量。这种增长超过了我们创造机器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周围到底有多少数据？增长的速度有多快？许多人试图测量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尽管测量的对象和方法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娜伯格通信学院的马丁·希尔伯特（Martin Hilbert）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据他估算，2007年，人类大约存储了超过300艾字节的数据。下面这个比喻应该可以帮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了。一部完整的数字电影可以压缩成一个GB的文件，而一个艾字节相当于10亿GB，一个泽字节则相当于1024艾字节。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

有趣的是，在2007年，所有数据中只有7%是存储在报纸、书籍、图片等媒介

上的模拟数据，其余全部是数字数据。但在不久之前，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的。按照希尔伯特的说法，数字数据的数量每三年多就会翻一倍。相反，模拟数据的数量则基本上没有增加。事情真的在快速发展。人类存储信息量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4倍，而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的增长速度则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9倍。难怪人们会抱怨信息过量，因为每个人都受到了这种极速发展的冲击。

量变导致质变。物理学和生物学都告诉我们，当我们改变规模时，事物的状态有时也会发生改变。谷歌能够几近完美地给出和基于大量真实病例信息所得到的流感情况一致的结果，而且几乎是实时的，比疾控中心快多了。同样，Farecast可以预测机票价格的波动，从而让消费者真正在经济上获利。它们之所以如此给力，都因为存在供其分析的数千亿计的数据项。

大数据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正是体现在这里。一方面，对大数据的掌握程度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来源。另一方面，大数据已经撼动了世界的方方面面，从商业科技到医疗、政府、教育、经济、人文以及社会的其他各个领域。

尽管我们仍处于大数据时代来临的前夕，但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它了。垃圾邮件过滤器可以自动过滤垃圾邮件，尽管它并不知道“发#票#销#售”是“发票销售”的一种变体。交友网站根据个人的性格与之前成功配对的情侣之间的关联来进行新的配对。具有“自动改正”功能的智能手机通过分析我们以前的输入，将个性化的新单词添加到手机词典里。然而，对于这些数据的利用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从可以自动转弯和刹车的汽车，到IBM沃森超级电脑在游戏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中打败人类来看，这项技术终将改变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上的许多东西。

### 预测，大数据的核心

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它通常被视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视为一种机器学习。但是这种定义是有误导性的。大数据不是要教机器像人一样思考。相反，它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一封邮件被作为垃圾邮件过滤掉的可能性，输入的“teh”应该是“the”的可能性，从

大数据不是要教机器像人一样思考。相反，它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一个人乱穿马路时行进的轨迹和速度来看他能及时穿过马路的可能性，都是大数据可以预测的范围。当然，如果一个人能及时穿过马路，那么他乱穿马路时，车子就只需要稍稍减速就好。这些预测系统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它们是建立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之上的。此外，随着系统接收到的数据越来越多，它们可以聪明到自动搜索最好的信号和模式，并自己改善自己。

在不久的将来，世界许多现在单纯依靠人类判断力的领域都会被计算机系统所改变甚至取代。计算机系统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远远不止驾驶和交友，还有更多更复杂的任务。别忘了，亚马逊可以帮我们推荐想要的书，谷歌可以为关联网站排序，Facebook知道我们的喜好，而LinkedIn可以猜出我们认识谁。当然，同样的技术也可以运用到疾病诊断、推荐治疗措施，甚至是识别潜在犯罪分子上。

就像互联网通过给计算机添加通信功能而改变了世界，大数据也将改变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它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大数据已经成为了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

### 大数据，大挑战

大数据的精髓在于我们分析信息时的三个转变，这些转变将改变我们理解和组建社会的方法。

第一个转变就是，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分析更多的数据，有时候甚至可以

事情真的在快速发展。人类存储信息量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4倍，而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的增长速度则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9倍。难怪人们会抱怨信息过量，因为每个人都受到了这种极速发展的冲击

处理和某个特别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与局限在小数据范围相比，使用一切数据为我们带来了更高的精确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以前无法发现的细节——大数据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样本无法揭示的细节信息。

第二个改变就是，研究数据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不再热衷于追求精确度。

大数据纷繁多样，优劣掺杂，分布在全球多个服务器上。拥有了大数据，我们不再需要对一个现象刨根究底，只要掌握大体的发展方向即可。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放弃了精确度，只是不再沉迷于此。**适当忽略微观层面上的精确度会让我们在宏观层面拥有更好的洞察力。**

第三个转变因前两个转变而促成，即我们不再热衷于寻找因果关系。**寻找因果**

只要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买机票的最佳时机，就算不知道机票价格疯狂变动的原因也无所谓了。大数据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

**关系是人类长久以来的习惯。**即使确定因果关系很困难而且用途不大，人类还是习惯性地寻找缘由。**相反，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无须再紧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会给我们提供非常新颖且有价值的观点。相关关系也许不能准确地告知我们某件事情为何会发生，但是它会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提醒的帮助已经足够大了。

如果数百万条电子医疗记录显示橙汁和阿司匹林的特定组合可以治疗癌症，那么找出具体的药理机制就没有这种治疗方法本身来得重要。同样，只要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买机票的最佳时机，就算不知道机票价格疯狂变动的原因也无所谓了。大数据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只要让数据自己发声。

我们不再需要在还没有收集数据之前，就把我们的分析建立在早已设立的少量假设的基础之上。让数据发声，我们会注意到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联系的存在。

但是，数据分析者太沉浸于模拟数据时代的设想，即数据库只有单一的用途和价值，而正是我们使用的技术和方法加深了这种偏见。虽然数字化是促成向大数据转变的重要原因，但仅有计算机的存在却不足以实现大数据。

我们没有办法准确描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数据化意味着我们要从一切太阳底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甚至包括很多我们以前认为和“信息”根本搭不上边的事情。比方说，一个人所在的位置、引擎的振动、桥梁的承重等。我们要通过量化的方法把这些内容转化为数据。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尝试许多以前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根据引擎的散热和振动来预测引擎是否会出现故障。这样，我们就激发出了这些数据此前未被挖掘的潜在价值。

大数据时代开启了一场寻宝游戏，而人们对于数据的看法以及对于由因果关系向相关关系转化时释放出的潜在价值的态度，正是主宰这场游戏的关键。新兴技术工具的使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宝贝不止一件，每个数据集内部都隐藏着某些未被发掘的价值。这场发掘和利用数据价值的竞赛正开始在全球上演。

大数据时代开启了一场寻宝游戏，而人们对于数据的看法以及对于由因果关系向相关关系转化时释放出的潜在价值的态度，正是主宰这场游戏的关键

**20世纪，价值已经从实体基建转变为无形财产，从土地和工厂转变为品牌和产权。**如今，一个新的转变正在进行，那就是电脑存储和分析数据的方法取代电脑硬件成为了价值的源泉。数据成为了有价值的公司资产、重要的经济投入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基石。虽然数据还没有被列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大数据对个人的影响是最惊人的。在一个可能性和相关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专业性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行业专家不会消失，但是他们必须与数据表达的信息进行博弈。这将迫使人们调整在管理、决策、人力资源和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

大数据会有负面影响。在信息化时代的早期，有一些政策专家就看到了信息化给人们的隐私权带来的威胁，社会也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规则体系来保障个人的信

息安全。但是在大数据时代，这些规则都成了无用的马其诺防线。

对我们而言，危险不再是隐私的泄露，而是被预知的可能性——这些能预测我们可能生病、拖欠还款和犯罪的算法会让我们无法购买保险、无法贷款、甚至在实施犯罪前就被预先逮捕。显然，统计把大数据放在了首位，但即便如此，个人意志是否应该凌驾于大数据之上呢？

就像出版印刷行业的发展推动国家立法保护言论自由（在此之前没有出台类似法律的必要，因为没有太多的言论需要保护），大数据时代也需要新的规章制度来保卫权势面前的个人权利。

政府机构和社会在控制和处理数据的方法上必须有全方位的改变。不可否认，我们进入了一个用数据进行预测的时代，虽然我们可能无法解释其背后的原因。如果一个医生只要求病人遵从医嘱，却没法说明医学干预的合理性的话，情况会怎么样呢？实际上，这是依靠大数据取得病理分析的医生们一定会做的事情。还有司法系统的“合理证据”是不是应该改为“可能证据”呢？如果真是这样，会对人类自由和尊严产生什么影响呢？

新环境要求旧规范与时俱进。

另外，寻找原因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一神论，大数据推翻了这个论断。但我们又陷入了一个历史的困境，那就是我们活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曾经坚守的信念动摇了。讽刺的是，这些信念正在被“更好”的证据所取代。那么，从经验中得来的与证据相矛盾的直觉、信念和迷惘应该充当什么角色呢？[当世界由探求因果关系变成挖掘相关关系，我们怎样才能既不损坏建立在因果推理基础之上的社会繁荣和人类前行的基石，又取得实际的进步呢？](#)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现任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信息监管科研项目负责人，哈佛国家电子商务研究中网络监管项目负责人；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信息与创新策略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大学、维也纳大学的客座教授。肯尼斯·库克耶系《经济学人》数据编辑。本文摘编自《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的电子版，版权为湛庐文化所有）

## 大数据：小心适得其反！

诚实的大数据从业者——数据科学家们持有高度的怀疑精神，他们为我们列出了厌倦大数据的一串理由

文 / 克里斯托弗·米姆斯

如果你还没有大数据，最好去搞一个。毕竟你的竞争对手有，小心他会羞辱你，甚至拐走你的女朋友。但基于大数据得出的假设存在许多问题，它最初是咨询公司和 IT 公司为了销售大单子而推出的。幸运的是，诚实的大数据从业者——数据科学家们持有高度的怀疑精神，他们为我们列出了厌倦大数据的一串理由：

一、即使是 Facebook 和雅虎这样的网络巨头也不常用大数据，Google 风格工具的应用也并不合适。

二、大数据已经变成“数据分析”的同义词，这样的误解适得其反。

三、大数据会令你投入不菲，产出却微乎其微。

四、有时候大数据既可解惑，也可致惑。

数据科学也有很多漏洞。数据的收集过程中也蓄意偏颇。背景资料的缺乏、完整数据中的漏洞、数据处理中的技术缺陷、以及整体的认知偏见，这些因素让最好的科学家都不能从无序的数字中“看出规律”来，就像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客座教授 Kate Crawford 所说的，“我们被淹没在算法的幻境中了”。换句话说，即使你真的有一组大数据，这不是信息技术系的随便一个人能搞定的，这需要一个具有博士学位或同等经验的人来研究，而且当他们看过数据之后，他们对你的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你根本不需要“大数据”。

(编译 / 张菁。来源：QUARTZ)

## 别急着为日本重振叫好

日本央行新行长上任后，大幅调整日本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预期。但作者认为，日本央行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难以实现

文 / Pierre Siklos 编译 / 孔莹晖

在最近的 G20 会议上，政策制定者对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其对日元汇率变动的影 响视而不见。与此同时，日本财政部长麻生太郎在《金融时报》中指出，日本政府试图扭转“经济滞胀”的局面，并结束被日本政策制定者认为是日本所有问题根源的通货紧缩。当然，一些人认为日本面临的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但政府不得不发射货币“火箭筒”，直到能够在两院制议会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

尽管在日本政策变化受欢迎，并且人们期待其成功，然而，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其会成功，而得出日本会重铸昔日的辉煌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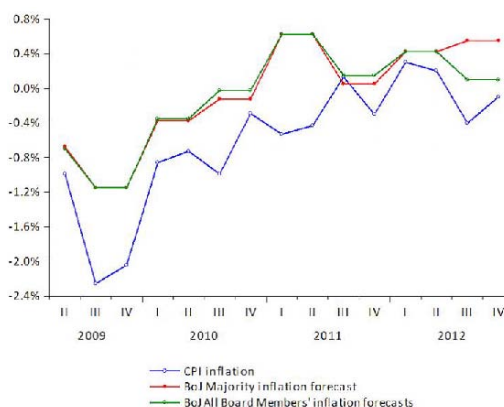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新央行行长似乎说服了政策委员会委员，大幅调整通货膨胀率和实体经济增长前景。央行行长上任后，委员会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显著上升。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的通胀预测中间值正好是 2%，与政府要求的一致。

这些形势的变化还产生了另外三个问题。第一，几乎所有的结构性改革承诺都没有实施，目前货币政策承担了所有重任。第二，在阅读日本央行的展望后，人们会明白为什么日本央行很可能达不到其通胀目标。如图所示，自 2009 年以来，政策委员会始终对通货膨胀率

感到乐观，但从来没有接近其制定的 1% 目标。

第三，尽管有关新央行行长会大幅放松货币政策引起轰动，日本央行预测实际 GDP 增速不会出现如政府所迫切希望的急剧增长。预期 2014 年和 2015 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1.5%。这些数字都难令人高兴。

也许财政部长和首相希望他们的乐观态度能推动经济的增长。不幸的是，尽管在日本政策变化受欢迎，并且人们期待其成功，然而，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其会成功，而得出日本会重铸昔日的辉煌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日本的货币政策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



图表来源：日本央行和作者的计算，取整个政策委员会或大多数成员预测结果的平均值

(本文原题为“Nothing But Blue Skies?”。本文作者 Pierre Siklos 是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CIGI) 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3 年 4 月 29 日刊于 CIGI 网站)

## 从瑞典事件到中国城镇化

近期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暴力冲突事件，看似意外，实则由来已久。从欧洲和美国在福利制度及移民政策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出一二，而如果把这些发现与中国的城镇化联系起来看，则能给人很大启发

文 / 北欧驼鹿、康向宇

### 一、斯德哥尔摩的暴力冲突

五月十三日瑞典警察在斯德哥尔摩的西郊的一个公寓里击毙了一个 69 岁老人。据说老人挥舞弯刀袭警，而警方说寓所里还有妇女。警方与目击者的证词不同。但估计是警方暴力过度。老人被射了十余发子弹，当即身亡。但警方却先说是送医途中而亡，后在目击者照片发布后又改口。几天发酵之后最终引发暴力抗议。

斯德哥尔摩是一个非常隔离的城市。游客看到的是市中心瑞典主流的天。经过战后的移民和难民潮，原本纯白人的瑞典社会现在已经有 10-15% 的人口是移民背景。若加上第二代移民，比例可能高达 20-30%。与伦敦巴黎一样，移民融入瑞典主流社会非常困难，在斯城的周边出现了一大片的移民区，相对贫困区。

在这些移民区里，学生教育不良，失业率犯罪率高，许多居民生活靠救济。失业，贫困，边缘化使得青少年的不满积聚多年，如同干柴，只等那星星之火。事实上，在瑞典其他城市周边移民区，青少年暴动已有不少先例。这次不过是在首都大规模爆发。连续四个晚上，烧汽车，商店餐馆，警局，向警车救火车投石。

### 二、拉美化的欧洲

郊区贫困化是一个二三十年的过程，左右两党都有责任。右翼本能地强调法律与秩序，铁腕弹压以显示其强势；左翼本能地将贫困化归究于右翼的减税减福利。在明年选举年前，这变成典型的左右之争的闹剧，但谁也不会真正解决问题。如同火山爆发而释放能量，它总会平静下去，静静等待下一次的来临。

欧洲现在实际上正经历拉美化过程。先前慷慨的社会福利是为种族相对纯而有向心力的封闭社会设计的一种社会契约：你工作赋税，生病失业我帮你。现在突然系统里出现这么多不工作不赋税的人，系统自然承受不了，系统的包容能力向心力下降。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半永久地排斥在外，当然社会整体的紧张感上升。

出路一是增税扩大系统包容力，但在右翼政府执政下行不通。二是将现有系统里的人降低平均福利水平来制造包容空间，主流社会当然不干。其结果就是拖而不决地牺牲一到两代移民的利益。这是欧洲今天普遍状况：一种拉美化过程，主流有意将一部分人半永久地置于弱势地位，社会同质度下降，相互责任感也下降。

这是欧洲今天普遍状况：一种拉美化过程，主流有意将一部分人半永久地置于弱势地位，社会同质度下降，相互责任感也下降

上次我带一个来访的美国朋友参观。与众不同地他要我带他去看斯城最好和最坏的城区。此次暴动的震源就是我带他去看瑞典人心中的坏区。看后他说，如果这就是瑞典的坏区，那瑞典还不错嘛。它也有着瑞典表面上的秩序。但这从市中心坐同一路地铁二十分钟出头的旅途，差别真是比从斯城飞去伊斯坦布尔还大。

首相莱因费尔德说，瑞典是民主与法治国家，再有不同意见，也不能通过焚烧汽车来表达，来反对瑞典的民主与法律。实际上，移民的处境正是这个民主的主流民意通过左右两党表达的结果。只要将他们隔离在郊外，不进入主流视野，民主就运作成功了。右翼条件反射地认为，警察，监禁，强压是解决问题之道。

问题是，一时可以强压下去，长久问题还会复发。左翼解决方法则是投入几亿税款，粉刷郊外房屋，建个青年之家，活动中心，或用税款多雇几个社工。但是这些青年，和社工谈完话，再从活动中心出来，仍然不能解决他们被隔离，失业和无前途的问题。就这样，警察越来越暴力，税款越花越多，情况却每况愈下。

### 三、重审欧洲移民政策

美国也时有骚乱，但总统一般不会质疑骚乱者的“美国身份”。在瑞典，同样情况下，这永远是首先被质疑的一点

移民与难民，一字之差却决定几代人生活轨迹。

比较欧美移民制度，原本福利水平不高的美国移民门槛反而较低。只要能吃苦，第二代即使成不了五月花的白骨精，至少也是“美国人”，除了当年排华和二战时的囚禁日裔，一般不会有人质疑你的“美国性”。而高福利而老年化的欧洲，一方面需要移民，一方面却又为了要保护现有系统里人们的福利而为移民融入设置极高的门槛，浪费资源。这样下去，欧洲只有不断的伊斯兰化了。

美国也时有骚乱，但总统一般不会质疑骚乱者的“美国身份”。在瑞典，同样情况下，这永远是首先被质疑的一点。首相咬文嚼字地说，在瑞典土地上要遵守瑞典法律，服从瑞典警察。潜意识中，是瑞典和飞瑞典的对峙，不管是否是公民或第几代。而在美国第二代中，会更容易培育出认同感。

而欧洲却至今在欧洲是否是移民国家此一问题上含混不清。出于人道主义，欧洲是可以接受难民的，出于劳动力市场需要，欧洲是可以接受工作移民的，甚至于出于钱，还可以投资移民。但移民二字之前一定要有定于一。言下之意，定于一不复存，你可是要走的。就这样，名不正言不顺间，欧洲的面孔却急速发生了变化。

要把这些人融入，最好当然是通过工作。但这却要将欧洲僵死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激进改革：雇主能轻易雇人，但也能轻易裁人。这可是现今欧洲左右政治的死穴，主流得益者怎能为了让新移民能轻易找到工作而放弃自己的享受多年的保障。僵持下，自八九十年代，欧洲的融入政策就进入死胡同，拉美化不邀自来了。

当然有部分移民进入中产，买房买车，生活红火，自认为 made it，但即使是他们的认同性也是可疑的，主体性也是不明晰的，总有寄人篱下之感，美国那样自然的二代美国人的主题认同感是没有的，有个风吹草动，主体性异性永远是第一个浮上水面的话题。

在欧洲历史上，对这种主体性认同体验最深的莫过于犹太人了。自斯宾诺莎到门德尔松，改教的，改名的，从事着社会相当体面的工作了。几百年过去，风向一转，仍不能防止它们的邻居欢天喜地地看着他们一家老小提着行李上卡车奔赴集中营的命运。

战后犹太人是高举着三个保命符来保持他们在欧洲的存在。第一是大屠杀、毒气室，犹太人不时要祭出这个杀器来提醒欧洲人规矩一点。第二是受众的强势的金权媒体话语权。就这样他们还是要有个以色列家园，以防万一。战后欧洲多文化主义至今才 60 年，这些没有金权的人若天真地以为就此真能融入了，那到了他们自己也提着行李上卡车的那天，想哭都晚了。

别的不论，就看看前南斯拉夫各族，肩并肩生活近上千年，时候一到，仍然毫无障碍地屠杀强奸邻人，这还是在欧洲土地上有自己历史家园的人。对所有新移民，从未在欧洲土地上有过历史家园的人来说，拉美化是不可避免的，合乎逻辑的，唯一的。清楚地认清这一点对在欧洲各族夹缝中存活下来是重要的。

康向宇：有些路不值得重走

以上是 @北欧驼鹿 君的文字，下面谈一些我自己的零碎而不成体系的感想。

福利国家制度更多是为内部高度同质化且有向心力的封闭小共同体而设计，这

清楚地认清这一点对在欧洲各族夹缝中存活下来是重要的

种通过高税收和再分配来维持高福利的制度，本就更适合于孟德斯鸠所谓的“小共和国”。高福利使部分人能够摆脱劳动这一生活的必然性，当怠惰之风蔓延，这一制度必然会出现危机。

在人口流动加快、跨国移民增多的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制度更多是一种“表面的公平”。为了维持系统的运作，有一部分人被永久性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共同体的同质化、向心力减弱，固化的社会阶层、激烈的社会矛盾使得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撕裂状态。换言之，这种只面向一部分人的“公平”以对另一部分人的不公平为基础，“福利”最终需要被剥削和排斥的边缘贫民阶层、乃至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为之买单。在欧债危机蔓延的今天，确实很难讲欧洲的所谓“福利国家模式”还能持续多久。

另一方面，两党在“郊区贫困化”问题上的相互攻讦与扯皮，将紧迫的社会问题变成典型的党争闹剧，这不会真正解决问题，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延迟决断”，且更容易导致积重难返。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过分软弱的民主缺少必要的决断力。通过“民主”的运作所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将边缘群体隔离在共同体之外，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矛盾加剧，但现有体制却无意、也无力做出更大改革，只能是小修小补乃至“强力维稳”，造成“国家政权内卷化”（杜赞奇语）——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即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而这些收入转眼又被用于小修小补和“强力维稳”，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如今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公共服务在短期内却难以均等，异地高考等问题均应放到这一现实背景之下，才能获得更深刻理解。不少国人对北欧“福利国家”充满了——或许更多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因此一个祛魅的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在这个时代这多少显得有些“政治不正确”。但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社会变革的渐进性、共同体的包容性、主体的认同性，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首先要做的，就是抛弃先入之见，回归问题本身。而这个问题之所以让我感触很深，是因为我觉得有些路不值得重走。

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社会变革的渐进性、共同体的包容性、主体的认同性，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作者北欧驼鹿系旅欧学者，康向宇系经略网刊编辑）